

刘道一 | 著

自发秩序 与 危机伦理

哈耶克新自由主义
经济危机理论的规范之维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自发秩序与危机伦理

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规范之维

刘道一 | 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发秩序与危机伦理: 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
规范之维 / 刘道一著. —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103-2355-3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哈耶克 (Hayek,
Friedrick August von 1899-1992) — 经济思想 — 研究
IV. ①F091.3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58640号

自发秩序与危机伦理: 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规范之维

ZIFA ZHIXU YU WEIJI LUNLI: HAYEKE XINZIYOUZHUYI JINGJIWEIJI LILUN DE GUIFAN ZHI WEI

刘道一 著

出 版: 中国商务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28号 邮编: 100710

责任部门: 国际经济与贸易事业部 (010-64269744 gjjm@cctpress.com)

责任编辑: 张永生

总 发 行: 中国商务出版社发行部 (010-64266119 64515150)

网 址: <http://www.cctpress.com>

邮 箱: cctp@cctpress.com

排 版: 书情文化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06千字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3-2355-3

定 价: 62.00元

凡所购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综合业务部联系。(电话: 010-6421224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盗版侵权举报可发邮件到本社邮箱: cctp@cctpress.com)

目 录

第一章 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	001
第二章 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史意蕴	007
第三章 古典自由主义与危机辩护	069
第四章 作为理论对手的凯恩斯	125
第五章 作为理论规范性来源的米塞斯	145
第六章 自发秩序与意图伦理：新自由主义危机论	161
第七章 危机伦理与“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误识	175
结 语	189
附 录	195
错置的“个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局限	196
自律、自主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内在问题	216
自然权利论的悖谬开端	241

第一章 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

新自由主义^①经济学意指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在70年代后期开始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力主经济自由的理论流派，它是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可以称之为以“自由”为名的“反启蒙的启蒙运动”，而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则将之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学说内部学派众多，包括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货币主义、弗莱堡学派、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新制度学派等。这些学派虽然在体系结构、观点、主张上各有特色，但也有相当多的共通之处，如都主张以适度的自由放任代替过度的政府干预、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代替控制利率、以浮动汇率代替固定汇率、以消除通货膨胀为经济政策中心代替以解决失业为经济政策中心等。总之，这一流派的经济学说主张实行新的自由放任政策，强化市场机制，提倡自由竞争。资本的逻辑设定秩序的建构和均衡的证明，正是当资本主义的利益生产被新自由主义以最无害的方式掩盖起来的时候，其根源性的威胁才因其不被察觉而愈发深重：资本的逻辑无非是根本上为少数人谋利，却宣称“公益”与“公意”。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根植于这样的逻辑，为这一逻辑所设定、塑造，成为资本主义欲望机制的工具。^②“当一个社会的人为其他人或他们自己的欲望压制时；当有人喜欢统治别人，并且有机会这样做，有‘权利’这样做的时候，这就表明了欲望与社会场域之间的深刻联系。存在着对压迫机器的‘无私’热爱：关于奴隶取得的这种永恒的胜利；关于那些痛苦的、

① 有关自由至上主义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的探讨，参见：Jan Narveson: *The Libertarian Idea*, Ontario: Broadview Press, 2001.

② 资本主义宰制之下的“分裂”，既是物质形态上的分离和分立，也是精神层面的隔绝与倒退：“那个由个体性和实体之活生生的直接统一体倒退而成的普遍统一体，是一个缺乏精神的共同体，它已经不再是个体的缺乏自我意识的实体，而个体在其中按照各自的自为存在来说，现在都是作为一些自主本质和实体发挥着效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5页。

沮丧的或软弱的人成功地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我们的方式。”^①借由资本的强力，新自由主义货币经济学家因其对资本主义这一“压迫机器”的“无私热爱”而获得（至少是在意识形态上）“统治别人”的“权利”，这些本质上“痛苦的、沮丧的或软弱的人”将自己变身为资本的规训的工具，^②资本主义社会也以自由主义之货币哲学的可工具化为尺度来评判理论的效用，或者说新自由主义只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构造一个有效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体系”，进而经济学说“就脱离于一切个体话语的‘有效性’本身而言，它也始终是在特定的、但更为宏大或包容性更大的真理体系中发挥作用的一种工具。”^③

与新自由主义者在资本的权力关系中的工具化倾向相伴随的，便是经济学本身的技术化。由于已不再存在一个可质疑的秩序建构原则（当然，这一点在凯恩斯主义特别是新凯恩斯主义那里仍有部分保留），同时也早已解除了奥古斯丁式的“天上之国”与“地上之国”的紧张关系，资本作为“尘世的权威”便毫无羁绊地为自身开辟疆域，任何理论体系要在其中容身，就必须按资本的逻辑不断地自我审查、自我矫正、自我治理以达到自我持存，而“自我持存的过程越是受到资产阶级分工的影响，它越是迫使按照技术装置来塑造自己肉体 and 灵魂的个体产生自我异化。”^④而更为可怕的是，“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这样一个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接受它的原则和制度，并把政治上的反对降低为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商讨和促进替代性政策的选择。”^⑤被货币哲

① 吉尔·德勒兹：《哲学的客体：德勒兹读本》，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8页。

② 正如米塞斯所强调的：“货币现象的前提是一种经济秩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货币和信用理论》，樊林洲译，商务印书馆，第23页。

③ 保罗·博维：《权力中的知识分子》，萧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

④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⑤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学所夷平的当代社会，就成为一个“没有反对派的社会”（马尔库塞语），也因而，就是在没有反动派的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也由此变成一个“没有危机的社会”，或一切现实的“经济危机”都将为哈耶克的理论修辞所说服。而这本书的写作，就是要展现哈耶克所实行的“伟大的说服”（可以说在今时今日仍旧维持具有影响力）的宏观的思想背景，同时揭示这样的“说服”背后，所无法克服的困难和必然导致的恶果。

以商品社会的通过货币进行普遍联系的意涵，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所开创的“奥地利学派”的以“货币起源”问题为源初研究范式的基点，在继承亚当·斯密的货币本质观的同时又将主观价值论融入到货币历史的溯源之中，也就是将“看不见的手”的论证预制为“自发秩序”理论的思想前提。由门格尔创始的这一理论派系从根本上反对边沁（或笛卡尔）式的理性建构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边沁在经济学中注入了狭隘的功利主义，因此推动了成本—收益（他认为这是可知的）分析这一套伪科学的发展；并催生了试图根据自己的臆想，使国家强制力量来改造社会的‘社会工程师’传统的出现。”^①基于“可知”或“可预测”的前提的理性建构主义，就是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作为“一套伪科学”的根据，也实际上是从对凯恩斯主义的“伪客观”原则出发的辩说。

门格尔强调行为过程的主观主义意涵，强调社会行为模式、制度是如何自发地演化而成的。在讨论货币问题时，门格尔认为，在还不存在货币而只能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获得所需产品的时候，真正的交换很难发生。于是，“有的交易者就意识到，如果他们能获得起他人也都需要的某种物品，他们就可以完成交易。于是，一个文化阐释的过程就开始了，大家都在努力推测别人的主观偏好。那些拥有符合别人较多主观价值的物品的人，就能更轻松地完成更多交易，从而变富了。别人当然也会注意到这种情况，并效法他们，这些人也开始使用那些物品作为交换中介物，随着中

① 德索托：《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朱海就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介物种类越来越少而每个人的需求越来越大，就能比较出哪种物品比较适合作为交换中介，最后，这一过程就集中到一种（或两种）物品上，它是大家主观上最想得到的，也能满足作为货币所必须具备的物理上最基本的要求（相对稀有、易储存、便于携带、容易分割等）。到这一过程时，就会有—种物品保留下来成为普遍接受的交换中介，也就是货币。”^①通过将人的主观偏好纳入货币演进史的分析，门格尔得出了全新的对于货币的起源的解释：货币并非交换过程的纯粹的客观结果，而是处在交换过程中的每一个利益主体的主观愿望的相互影响创造了货币这一制度性存在。“随着各个经济人对其经济利益认识的提高，总是没有任何协调与法律强制，纵使不是为着公共的利益，各经济人也将情愿提供其商品与那些虽非自需、而销售力较大的商品交换。从而，在习惯的强力影响之下，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就到处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在当时当地销售力最大的财货，再交换中最为一般人所乐于接受，因而也最能与其他任何商品相交换。对于这样一种财货，我们的祖先曾以‘通用’即‘服务’‘支付’来称呼它，到最后才名之为‘货币’。”^②

在对货币起源的“哲学”论述中，门格尔强调货币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设计的产物。“关键是参与者根本就不必意识到他们是在参与创造货币。事实上，如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货币是何物，他们又如何意识到他们在创造货币？因此，货币制度就是人们行为/交换的一个无意识的结果，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人们的行为启动了一个发现的过程，最后却创造了某种制度，对此，没有一个参与者是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努力，甚至根本就无人做过如此想象。”^③在此，门格尔的货币创造过程说极大地类似于斯密的“追求着私利却最终促进了公益”的“看不见的手”的表述，强调货

① 拉齐恩·萨丽等：《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秋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7页。

② 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62页。

③ 拉齐恩·萨丽等：《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秋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7-188页。

币创生的自然性与“非设计”自然而然地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站在了对立面。门格尔指出，货币的起源“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它受立法的影响极少。它不是国家的发明，也不是立法行为的产物。国家的批准与货币概念全无关系。一定商品因经济关系而自然成为货币，丝毫也不需要国家的力量。”^①门格尔的“丝毫也不需要国家的力量”的货币理论“从评价乃至无数个人主观理解的概念出发，最后则以形成完全是社会性的制度为依归。”^②而门格尔对货币的“自然—自发”^③意涵的强调，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学说的（基于对发现结果的“无知”的）“自发秩序”论，也同凯恩斯学派基于理性建构主义而提出的通货膨胀和举债政策针锋相对，形成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根本的张力。而对于这一号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的理论建构的准确评断，就需要首先回到“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所由以创生和辩护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语境”（Context）之中，才可以找到所谓“认识世界”的本质性洞见。

① 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65页。

② 拉齐恩·萨丽等：《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秋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8页。

③ 这样的自然意涵恰恰是与古典时代的“自然”相反的目的论图景之下展开的，新的理论“建构”。

第二章

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史意蕴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形态是普遍的、周期性的、商品生产过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自由主义时代，劳动不仅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而且在实际上也从属于资本。因此，以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建构的物质性力量为契机，以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的整全性（Totality）为结果的现代资本主义（在某一理论视角下被“强制”地描述为“通往自由之路”^①）的机器大生产的形成和发展，就成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危机产生的条件；而相应地，经济危机“这种现象并不是像地震或其他天灾所造成的后果那样罕见的意外事件。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发生的频率也是有规律的，每十年预期就会发生一次，或者一次以上。显然，以这种弊害为特征的制度，一定会遭到反对者的严重非难。社会主义者声称，这种弊害是实行利润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一天，就无法消灭，虽然可能暂时减轻；但是，一旦实行了社会主义集中计划，就可以根除了。”^②

作为奠基性的“范式”（Paradigms）界定，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定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分：“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③自1825年起到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的19世纪60年代，普遍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1837、1847、1857、1866分别爆发，针对这一情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

① 对于市场自由主义的“道德论证”路线，参校：布鲁克斯：《通往自由之路》，高菲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② 庇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谨斋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2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17页。

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关系。”^①而在1825年之前，虽然全面的、主导性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建制远没有完成其统治性的架构，但是，基于资本—市场的“交易正义”观念而爆发的（并非通常所认为的“失控”的）商业、货币、信用危机也时有发生，并给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显著的冲击。^②

哈耶克的经济危机辩护，很大程度上是在故意忽视长波理论的理论洞见对这一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建制期）的刻画，由此，对他的“规范性”经济思维，必须建基于对于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非理性”）体系的危机发展史^③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危机辩护史的总体性把握，考察在工业革命引导下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时代命题下的前1825年经济危机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01页。

② “在机器大工业出现以前的十八世纪上半叶和八十年代以前，尽管地方性的商业危机和货币危机已经不断地发生，但还不存在着生产甚至局部性生产过剩危机的条件。当时的经济学家只能以商业的投机，信用和货币制度的失调等等属于流通领域的错误为这类危机作解释。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后的产业革命过程中，生产过剩危机的条件逐渐成熟了，某些经济部门的局部生产过剩的现象再也不能予以否认了。但当时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仍企图以外在的因素作为引起危机的基本原因。到了1825年前后，危机的范围扩大的可能性显露了，危机的威胁增加到严重震撼整个经济的程度。于是理论的发展才集中于是否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有规律性的经济危机的问题。”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25-226页。

③ “虽然生产过剩是周期性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但就历次经济危机而言，又呈现出其他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在经济高涨的时候投机猖狂，金融系统总是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等等，这些相似的现象，几乎在每次经济危机中都有所体现。”张廷伟：《经济的坏脾气：全球经济危机史（1637—2008）》，金城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的“自然权利”^①（Natural Rights）的经济—政治特征及其在理论上的反应，以现实的经济史的认识为讨论基础，结合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对于“秩序”问题的相互辩难，深入揭示当时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不可能（或“不希望”）认识到危机之必然性与灾难性的思想根源，以此来进一步理解那被马克思所提出的“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鬻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②的真正意涵。

资本主义并非从来就有的，资本主义“市场”（及附着于其上的“适应性情感”）亦如是。在现时代被封为主臬的市场金律（也是不可以“政府”之力去触碰的市场“禁律”）在整个中世纪都是被打压和挞伐的对象，意图冲破禁欲宗教的严苛管控而逐步成为西方世界的“普适”价值，非经历一番卓绝的意识形态上的“开创”之举不可。这其中，如何将“危机”无害化、常态化、科学化进而“周期”化，就是这些工业革命与欲望扩张的信仰者们需要完成的“伟大的说服”（Great Persuasion）了。

① “自然权利的来源是十分明显的。一个人有权利保护他的身体不受损害，而且在没有正当理由剥夺自由的情况下有权利保护他的自由不受侵犯，这是毫无疑问的。”坎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5页。但是在晚近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又出现了对所谓权利的“自然解释”的反驳，他们认为这种“自然主义”的实证论证并不能抓住人类行为的关键性意涵，而应当以人之为人的独特性为核心，构造论证。“自负的实证主义者也许希望，终有一天，生理学家会成功地用物理学和化学描述所有那些产生了特定的个人的事件和在其一生中改变其天性的事件。我们可以不追问，这样的知识能否充分解释动物在每一种它们必须面对的情况下的行为。但毫无疑问，这样的知识无法解释人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因为人的这种反应是由观念决定的，而观念这种现象不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所能描述的。自然科学根本无法解释，是什么使众多的人一生忠于自己从小接触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使另一些人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人们为什么加入或退出政党，为什么会有许多不同的哲学流派，为什么对于许多问题会有不同的意见。”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一篇关于方法的论文》，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页。

由此可见，对于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之理想性的信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因信称义”的“秘教”典仪，也是以自由主义为名的“信仰寻求理解”的社会历史性建构行为，并作为现代世界之思想与政治的核心议题而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致命的自负”招致“自负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自16世纪发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以牟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为转移，而重大创新和经济结构转换则耗费大量资金，流转周期长，风险大，且在一定时期内盈利少，所以，资本家往往不仅对重大创新和经济结构转换不感兴趣，而且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力图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以旧的工艺流程、旧的技术和设备、旧的产品获得最大的利润，这就从方向、速度和数量等方面制约着正常投资，尤其是遏制了资本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拖延了重大创新和经济结构转换，使旧的部门内资本积累长期过剩，而新兴部门资本积累不足，各部门之间的比例长期失衡，也就是结构转换不畅。当这种结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使旧的部门的过剩资本出现贬值和毁坏，并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破坏，即发生结构性危机。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能在一定时期、一定限度内拖延重大创新和结构转换的进程，而不能排除这一进程。生产力终将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羁绊而向前发展，即实现重大创新和结构转换，并迫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自我扬弃来适应这种发展。但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便构成了经济的长期波动。因而长波的降波便形成了结构性危机的表现，长波的升波则反映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无可辩驳的事实使人们难以否认资本主义发展中这些长波的存在。所有能够得到的统计资料都清楚地表明：如果我们把工业产量的增长和（世界市场的）世界出口增长作为关键指标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在1826—1847年、1848—1873年、1874—1893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自发秩序与危机伦理：

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规范之维

1894—1913年、1914—1939年、1940—1967年的这几个时期中这些指标的平均增长率发生显著的波动，各个相继出现的长波之间上下波动幅度为50%~100%。”^①

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思考，在“革命”的名义下获得证成。“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革命，除了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之外，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任何形式的革命。”^②也正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的世界“想象”之中，“西方”作为一种“普适性”与“普世性”而展开其（卢梭所阐述的）全球性“侵蚀”，这也就在贸易的发展、市场的扩展与工业革命的高歌猛进中，开始了其“不可抗拒”的历程。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第一次长波，其中，长波的升波阶段发生在1790—1825年，由首次结构性危机和失衡引起的降波阶段出现在1825—1845年（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这一次长波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经济变革的发生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转换：由农业社会逐步向工业社会过渡，即实现工业化，逐步由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由内向型经济转化为外向型、扩张性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其基本形式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和自由竞争机制开始形成；以英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得以确立；产业革命期间资本主义积累矛盾的尖锐化与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

从中世纪末期的15世纪以来，通过地理大发现和欧洲对海外的殖民贸易，以及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基本标志的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和工场手工业的长期发展，新兴资本家阶层不仅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获得了丰富而廉价的生产原料、广阔的市场和大批自由劳动者，而且使劳动工具不断改进，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逐步提高，分工日益精细，从而使生效率逐步提高，再加上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重大科学发现，这一切，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奠定了强大的现实和理论的基础。而由于地理大发

① 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页。

② 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页。

现造成的世界商业航线由地中海流域向大西洋流域转移，英国开始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通过圈地运动实现了对农民生产资料的有力剥夺，加上宗教、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彻底性和海外大量人才移居英国，为英国成为第一次长波升波的发源地和中心开辟了道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8世纪后期，在英国首先发生了以棉纺织工业为主导产业，蒸汽机制造业为基础产业作为标志的第一次长波的升波。而我们也正可以在对这一“升波”阶段的构造性因素的探讨中理解1825年危机之前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与危机（作为“降波”的经济波动态）隐忧。

1. 对外贸易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创造条件

从15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是欧洲贸易大发展的时代，也因此是现代“市场体系”开始成形的年代。这种发展体现在贸易量的增加、贸易区域的扩大、商品交易品种的增多，以及商贸制度的创新等诸多方面。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贸易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过与此前的中古时期相比，作为一个整体，欧洲的贸易发展是比较快的。14、15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地中海区域贸易较为发达，它主要从事东西方商品的中介贸易。其中，威尼斯在打开欧洲内部和地中海地区各国间的贸易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新航路开辟后，贸易中心逐渐转移到大西洋沿岸。16世纪，葡萄牙取代威尼斯在海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17世纪，荷兰控制了国际贸易的很大比重，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力量。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英国后来居上，在国际商贸中占据了上风。对于这一特定的发展，恩格斯指出，在这一时期：“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融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①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页。